



“出国潮”流向世界后

大陸留洋

最新紀實

今日中国出版社

“出国潮”流向世界后 ——大陆留洋最新纪实

林海梅 编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关心“出国潮”命运的读者朋友

曾经轰动一时、震撼中国九州大地的“出国潮”如今是涨？是退？是沉？是浮？

那些如潮似涌的留洋者，黑眼睛、黄皮肤，置身在欧、美、澳的“蓝色文明”，其真实之感觉、其现实之际遇，又将如何？

一批批涌向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在阳光明媚、广阔灿烂的海滩边，在鼻梁高挺、金发碧眼的人群中，他们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什么面貌和人格？海内、海外，他们的形象有什么新的变化？

成就学业者、淘金挣钱者、寻亲访友者、考察观光者……以至无所目的而来到国外的大陆中国人，他们的生存现状到底怎样？他们已有什么样的结局？在发愤？在奋斗？在挣扎？在迷惘？已沉沦？已消失？已腾达？已成功？

本书将向广大读者展现的是，他们的希冀与失望，他们的失落与自卑，他们的骄傲和醒悟，他们欢乐的泪水和痛苦的悲痕，他们一帆风顺的喜悦和坎坷曲折的感慨……一首首凝结着心血和汗水的悲歌，一曲曲充满悲壮和艰辛的奏鸣，夹带着一缕一簇温馨甜蜜的记忆，感人心扉，启人心智。

本书全部内容都是第一手材料，均为世界各地已生活在异邦多年的出考提供，真实真切、精彩客观。

——编者

目 录 提 要

客居瑞士的日子——一个艺术家的自白 王为政 (1)

伯鹿——一个美院的留校高材生,放弃国内的安定生活,只身来到风光旖旎的瑞士闯荡世界。他刻苦地学习,玩命地打工;穷困之际、孤独无援之时,瑞士的“修女 Sister”和苏茜女士,都伸来援助之手,他终于在异域他乡迎来了首次个人画展的成功!

纽约的白日梦 艾 丹 (10)

一名中国的穷小子来到繁华豪富的纽约,磨洋工,骗老板,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幻想驰骋。做一个百万富翁的憧憬:是绚丽缤纷的七彩虹?是海市蜃楼的白日梦?

旅美华人不说“从大陆来” 余小华 (31)

“我”刚踏上美国的土地,朋友们就告诫说:“别让人知道你从中国大陆来。”“我”听从了。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公开宣布:“我就是大陆人!”从此,“我”就作为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去真实地感受世界,有欢乐,也遇到了令人烦恼的波折……

漂流加拿大记事 兴天国 (37)

北京某研究所一位女研究人员,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夹在各种肤色的青年中间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这位清贫而自尊心又极强的中国知识分子,海外异邦的每一桩小事都不能不在心中激起巨大的震动。她与前来伴读的丈夫一起打工、购物、建家……艰难世事,辛酸之情,创业奋斗,感慨良多。

大洋彼岸的黄河儿女 曾应菁 (63)

柏文 4R 的 4 名中国房客:背景不同,抱负不同,却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同一个“家”里。他们就象一叶叶随波漂流的扁舟,又怎能忘怀自己是大洋彼岸黄河的儿女呢?!

澳洲——美丽的谎言 皇甫君 (81)

1857 年,从悉尼和墨尔本等地登陆,拖着沉重疲劳的双腿奔向金矿的中国人约有 4 万。时隔 100 多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新一代的中国人以学生身份,再一次登上澳洲大陆,形成“黄色浪潮”,人数也约 4 万。美丽富饶的澳洲向他们展示了什么?本篇纪实将告诉读者,在新奇陌生的国土上,他们三五成群,号称“扫荡队”,向每一个能够找到“饭碗”的角落搜寻,尽全身解数。为了生存,他们中间有人充当了“咬狗”,有人做了“黑民”,有人进入“红灯”……

客居瑞士的日子

——一个艺术家的自白

· 王为政 ·

长尺送我去国门，
夜渡银河展剑魂。
阿尔卑斯迎远客，
东来豪士轩辕孙。

1988年初春，我应瑞士巴塞尔的克利斯托夫·迈利安基金会之邀，前去参加“国际艺术家交流计划”(IAAB)的活动。

一踏上瑞士的国土，我就立即感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因为宾主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阻隔：语言。瑞士不大，语言却很复杂，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罗马语都是官方语言，巴塞尔属德语区，而他们使用的又不是正规德语，连德国人都听不懂。虽然在知识分子当中英语也可通行，但不幸我在学生时代正式学习的外语却是俄语，而英语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足以应付自如。要求对方讲汉语是不现实的，瑞士人有一句口头语，遇到最棘手事就说：“简直像是学中国话！”这是他们认为最难的事儿，而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邀请我前来的“IAAB”机构根本没有翻译人员！那么，我们该怎样“交流”呢？

那天，我刚刚住下，就有人敲门，用中国话问：“王老师在吗？”

“请进！”

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但他很像我的那些熟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我的同胞！在语言不通的金发碧眼人当中遇见他，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个相当朴素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上身穿一件粗毛蓝布的夹克衫，下身穿一条深蓝色旧长裤，连裤线也没有，足蹬一双过时的球鞋。头发半长不短，随随便便地盖住半个额头，像个未成熟的孩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洋味儿”。唯一和这些不甚协调的是上唇的一抹浓黑的短髭，鲁迅型的。

我和他握手。他腼腆地微笑着，自我介绍：“我叫王伯鹿，天津来的，在巴塞尔美术学院留学。听说从国内来了一位画家，来看您……”

一切都出乎意料，这儿不仅有自己的同胞，而且还是同行，我们可以找到比任何人都更切近的共同语言，他将为我所肩负的国际艺术交流使命的完成带来极大的方便！

从那一天起，伯鹿便责无旁贷地做了我的翻译、向导和“参谋”，并且成为形影不离、肝胆相照的挚友。我们一起奔走于藏珍集粹的美术博物馆，在伦勃朗、罗丹、莫奈、梵高

……的传世名作前流连忘返，纵论中西绘画的发展；一起沿莱茵河溯流而上数百里，赞赏那“拔木摧山朝天啸，长垂白发六千年”的飞瀑奇观；一起泛舟比尔湖，“轻轲探幽彼得岛，徐行问迹卢梭居”；一起南下日内瓦，“翠坪铺就五洲路，玉阶筑成万国宫”……有了伯鹿，我便进入了“自由王国”。和异国同行尽情交谈，竟没有感到语言的障碍；在各种形式的聚会中，在广播电台的录音采访中，一个中国画家的心声通过他准确无误地转换成德语和英语，这，并不是每个精通外语的人都能做到的。

在巴塞尔，伯鹿简直成了我的“另一半”，以致于 IAAB 的负责人有事找我必同时找伯鹿，如果我单独出现在某种场合，熟人便自然发问：“伯鹿呢？”

伯鹿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自愿的、自觉的、无偿的，IAAB 的负责人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给他以报酬，而按瑞士的惯例，聘请一位翻译、向导理应支付很高的佣金。我对此深感不安。伯鹿却一笑置之：“我不认为是在帮他，而是在帮我们自己人。别跟他提钱的事儿，不能让外国人把中国人看小了！”

逆子·弃儿

他把中国人的人格看得很重，很重；把钱看得很轻，很轻。而我却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他去外国远游，发愤读书，一不靠国，二不靠家，靠的是自己两只手，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打工挣钱。在瑞士不是有我们的公费留学生吗？祖国舍得花钱，送他们出来学化学、医学，却没有一个是派来学艺术的；在瑞士不是也有我们的自费留学生吗？瑞士舍得花钱，给他们奖学金，却也同样没有一个艺术学子得此厚遇！

三月的一个周末，瑞中友协和中国留学生联合举办“饺子会”，邀我参加，我便请伯

鹿同往。

伯鹿面有难色：“和那些公费生联欢？我真不想去！我来巴塞尔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没有一点儿友好的表示。他们跟我没关系！”

伯鹿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不“随和”，但为了陪我，还是极不情愿地去了。

留学生们的宿舍，条件相当好。有阅览、游艺室，有礼堂，祖国的使馆常派人来放电影，组织种种活动。他们是母亲的“骄子”。而伯鹿是被排除在外的，他在远离这儿的另一条街上，租了一间卧室兼画室，默默地生活，默默地笔耕……

果然不出所料，公费生们对他似乎很冷淡，仅仅握手而已，没有几句话好说。也许是因为我和伯鹿在相貌上看来年龄差别很大吧？他们称我为“大画家”，称伯鹿为“小画家”，把他看成是刚刚入门的艺徒，一个普普通通的“Student”。

伯鹿犯了犟劲，昂然说：“我在国内早就和美院毕业留校的教师了！”

伯鹿很难解释清楚这一切，似乎也不屑于解释，浓黑的小胡子抖动着，两道剑眉微蹙，几乎连在了一起，误解、屈辱，尽在不言中。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不那么容易！

这顿“饺子宴”吃得很不是滋味儿。宴罢，已是子夜时分，末班车赶不上了。使馆的官员要开车“带”我们一段，我们却婉谢了，徒步走回去。我路不熟，伯鹿先要送我到“家”，然后再回自己的“家”。

我们沿着莱茵河岸慢慢地走。初春的深晚，清凉而静谧，巴塞尔街头已经不见车辆和游人，敏斯特教堂那举着十字架的两座尖顶肃穆地耸立在撒满的星斗的夜空，漫长的河岸上盏盏路灯在流水中投下一条条跳动

的光带。莱茵河奔腾咆哮，在夜深人静之时显得很响，像一部庞大的乐章。石块铺成的便道上，留下我们的一串足音……

此时此刻，我的脑际萦绕着一个早想发问却有碍于口的问题：**伯鹿自费出来留学，其中有什么隐秘？**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伯鹿回答我的，竟是李太白的《将进酒》。立时，一个豪放不羁而又抑郁愤懑的形象扣动了我的心弦。

应该说，伯鹿毕竟不是李太白！

“我是个逆子。”伯鹿缓缓地说，路灯照着他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反射出生铁般的寒光，“逆子，不肖子……”

我们伫足河岸。莱茵奔流不止，逝者如斯夫，仿佛生命在叙说……

1957年，伯鹿出生于天津的海河北岸，这是一只小鹿，头上长角，四蹄生风，从小就表现出无法驾驭的任性。两岁时便常常在幼儿园“失踪”，母亲找遍全天津，发现他一个人在荒野里，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云彩。揪回来狠狠地打！任凭你怎么打吧，他不哭，不求饶，也不伸手挡一挡，怕硌疼了妈妈的手。直到母亲打累了，打得自己掉泪了，才无可奈何地住手。父亲则不打也不骂，只是默默地叹息。他伤透了父母的心，为了管束他、整治他，把他交给一位武林高手。不料儿子却在食不果腹的年代练出一身童子功，在小学、中学，简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鼻青脸肿上门“告状”的应接不暇，父母更管不了了。

初中毕业，他又完全违背父母的意愿，疯狂地迷恋上了美术，考取了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并且立志把终生奉献给艺术之神。3

年毕业，正当他雄心勃勃向高等美术学府攀登之际，却被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因为政策规定：中专生必须在工作两年之后才准许参加高考。迫不得已，他一面当“孩子王”，一面苦练油画，等待重新起飞的一天。两年熬到了头，他提出要报考美院，校长却当头泼来一盆冷水：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美术教师，不能放！伯鹿趁校长外出开会时，请求书记开了一张介绍信，奔赴考场而去。

他果然一举成功。但是，当天津美院决定要录取他时，却有一些人联名“告状”，说伯鹿所在的那所小学“弄虚作假”，因为按照新的政策，教师又不能参加高考了。

美院当即派人调查，接待来访的正是那位扣住伯鹿不放的校长。冤家路窄，生死存亡就决定在他手里了！

校长沉吟片刻，首先询问伯鹿的考试成绩是否达到录取标准，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时，坦然地说：“你们尽可以录取他。我们没有弄虚作假。王伯鹿只是临时兼美术课，他不是教员，是专职团委书记，有案可查，任命书还在嘛！”

伯鹿做梦都没想到他那个挂名“团委书记”职务此时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更没有想到被他视为克星的校长在关键时刻竟然拔刀相助，挽救了他的艺术生命！该怎么重新认识这位校长呢？也许校长前后判若两人的作法，同出于一颗爱才之心吧？

伯鹿进了梦寐以求的天津美院油画系，四年的时间，他把命都拼上了。同宿舍的同学几乎看不见他睡觉：每日黎明，他便起身练功；半夜不归，还在教室作画。查夜的人和他都混熟了，到了该熄灯的时候，亮着灯的那屋准是王伯鹿……

他自学英语，颇为出色。毕业时，天津美院留下了他，搁到图书馆里当“翻译”。图书

馆有许多英文原版美术书籍,没人译,没人管,他正好“人尽其用”,填补这一项空白。

一个油画系的高才生被这样使用,他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为了他心目中神圣的艺术,为了明日的进取,他应下了这个差事。每日里搬书、查书、编目录、造表册,打印一式8份。复印不行吗?不行!复印得花钱,你打1份也是打,打8份也是打。用的是一架百岁高龄的老爷英文打字机……也许天津美院的后来人要感激他所做的功德无量的好事,但他自己却感激图书馆,给了他一个知识的海洋。他以馆为家,挑灯夜读,把什么珍本书、善本书、孤本书都读遍。空闲时间就练笔,图书馆挂满了油画……他在书库中苦苦修行了两年。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难道就这样“窝”一辈子吗?

某日,他在字纸篓里偶然看到一封信,是英文的,因为没人认识,就干脆扔了。他纯粹出于好奇而捡了起来,略略浏览,眼睛一亮!这是瑞士瓦累的一所工艺美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在向全世界呼唤学子!

他兴致勃勃地向领导报告这个好消息,领导却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上哪儿再找这样的翻译去?你要深造,也只能学图书馆学,毕业了再回来。学艺术,不行!

……他终于考上了自费留学生!

1986年9月,伯鹿悄然离开了天津美院……

从中国到瑞士,飞机只需一夜行程,而火车却要爬行一个星期。伯鹿坐不起飞机,只好舍近求远,他从北京登上国际列车,身上只有100美元的盘缠。此一去,也许三年五载,也许十年八载,全靠自己了。列车北去,在车轮越过国境线的一刹那,他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弃儿”!

列车穿过蒙古草原,驶过西伯利亚,向

欧洲腹地开去。伯鹿啃着干面包,望着车窗外的景色。啊,西伯利亚,当年俄国囚徒流放的地方,惊人的美,惊人的悲壮,惊人的荒凉!

回首望故国,山复水复不可见。他的心里呼唤着母亲:妈妈,别忘了我,您的“逆子”永远爱您!

……

夜寂寂,路漫漫。我们伫立路灯下,我看见他的眼眶中滚动着男儿泪。在我们的脚下,莱茵河呜咽着奔流不息。可惜,它不像黄河长江那样流入东海,无法捎去天涯游子的万种情思!

贞女和童男

伯鹿终于来到了瑞士南部瓦累州的首府西昂,见到了那位称他为“亚洲的天才”的校长。

这所学校却让他失望。所谓“欧洲闻名”的瓦累工艺美术学院只是一所私立学校,并且从校长到教员只有一个人,在一间工作室里教十几个学生学习彩色玻璃镶嵌工艺,像个小手工业作坊。但是,为报校长的知遇之恩,他决心学下去,把对中国来说还是“冷门”的彩色玻璃镶嵌工艺学到手。学费是高昂的,他向中国驻瑞使馆求援,一无所获,因为他不是公派的,爱莫能助。还是这位校长想了办法,请求瓦累的银行资助,交换条件是把伯鹿的一批作品作抵押。艺术家没有一个不珍惜自己的精品的,伯鹿忍痛精选了100幅油画送给了银行,以求生存。可是,以此换来的5000瑞士法郎并没有给他本人而直接转给了校长,伯鹿的食、宿、学费都在里面了。

他像饿鹰擒兔那样贪婪地吞咽着知识和技艺。瓦累是法语区,校长用法语讲课,他听不懂,课上把眼睛当耳朵,课下再用英语

请教,并且逼着自己从头学法语,决不肯在竞争中落后别人半步!校长示范用的工艺材料,他都偷偷地留起一块块碎片,学校里的机器,他都私下拍了照片。他要积累一套完整的资料,将来带回中国去,有用。中国现在到处高楼林立,如果让彩色玻璃装饰壁画从西方的教堂走进东方的现代化建筑,当是一项创举!中国,中国,这个凄然出走的“弃儿”竟然时时忘不了母亲!

西方花花世界的一切都与伯鹿无缘,学校提供给他的是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已。他和同学们住在“学生旅馆”,这是教会办的一个慈善机构,供他吃、住,由学校每月替他们 550 个瑞士法郎。瑞士人每周只工作 5 天,“学生旅馆”也只供应 5 天的饭食。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旅馆”停灶,有钱的同学尽可以上街吃饭,可是他,已囊空如洗,一文莫名。但他不愿意向任何人乞求怜悯和施舍,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骨气。负责管理“学生旅馆”的是一位修女,学生们称她“sister”。终于有一天,这位细心的 sister 无意中窥破了伯鹿着意保守的秘密,面慈心软的大姐姐难过地哭了:“啊,上帝!他竟然每个周末都是饿着肚子熬过来的!王,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sister 那洁白细腻的手颤抖着,从自己的钱包中掏出 10 个瑞士法郎;“王,去街上吃点东西吧!”

伯鹿咬着自己的嘴唇,久久没有伸手去接那银光闪闪的法郎……

他凝望着 sister,那和善慈祥的面容,不是怜悯,不是施舍,而只是友谊,是她作为一名教徒的本性:善。她献出的是博大的母性的爱,却并不需要回报。伯鹿不信她的宗教,但是,人和人的心却沟通了。他终于接过那带着体温的法郎,痛苦和感激都没有外露

……

三个月过去了。伯鹿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掌握了彩色玻璃镶嵌工艺,校长的“绝活儿”学到了手,完成的作品超过同学们许多倍。校长不安了:“这样下去,我供不起你用的材料!如果要继续学习,得想一想该怎么办了!”

恩师发出了“逐客令”,“亚洲的天才”愣了。同学们也纷纷议论:你在中国已经是有了大学文凭的画家,根本不该到这儿来。这所私立学校又不能给你学位!

这些异国同窗根本不可能理解伯鹿的苦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向谁诉说呢?离愁别绪勾起他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他恨不能一步投回母亲的怀抱,但是,不能走,这样回去,何颜以对江东父老?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时,不期而至的一个电话给濒临绝境的伯鹿带来了新的希望。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士慕名来访,得知他的境遇,便极力向首都伯尔尼的美术学院举荐,并且陪同他去见院长。院长看了伯鹿的画,不经考试便当场拍板:“这样的学生我还能不要吗?”

无心插柳柳成荫。伯鹿收拾行囊,离开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瓦累。100 幅精品取不回来了,就算顶了三个月的账吧,只是太昂贵了!那位称他为“亚洲的天才”的校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再见吧!瓦累并不让他留恋,依依惜别的只有那位 sister。修女的眼睛红红的,抱住伯鹿,吻了他 3 次。修女是从来都不吻人的,她把生命、青春、爱情都奉献给了心中的崇高的信仰;伯鹿也从来没有接受过除了母亲之外的任何人的亲吻。没有接触过任何女性,他的一切也都属于不可动摇、无可替代的信仰:艺术。东方童男,西方

贞女，真情的吻别纯得像阳光、空气和水！

中国血

春天的瑞士，处处是绿茵，满眼是鲜花，空气清新得像刚刚洗过。

伯鹿是1986年年底到达伯尔尼的，进入了堂堂正正的官办美术学府，选修雕塑、色彩研究、素描，并且到校外进修油画，同时跟玛丽安娜·卢波老师学习德语——在伯尔尼必须用德语了。

他每个学期要交1000多瑞士法郎的学费，此外还要自费解决食、宿。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不要指望再有什么“慈母”，从今以后，大丈夫要自食其力了。

他从邮局谋了一份送报的差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报童歌》所唱的那种营生：“大风大雨满街跑，一面跑，一面叫……”所不同的是他不必“叫”，只是默默地把报纸塞到一家一户的信箱，一直送完这条街。这条街离中国使馆很近，很近……

30岁的小伙子，已经不是报“童”了。出于那极强的自尊心，他每天四点钟就去送报，免得碰见人。伯尔尼街头寂静清冷，路灯下，只有他自己形影相吊，拿着报纸，一家，一家……然后再去上学。瑞士多雨，他没有雨伞、雨衣，大雨打湿了他的黑发，浸透了他从中国穿来的单薄衣衫，他紧紧地护着报纸，在风雨中奔跑。阴冷的清晨，谁能给他一丝温暖呢？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每天的报纸是由一个中国画家送来的，他只偶尔碰上一些扫街的工人，彼此并不认识，却微笑着打个招呼。都是为谋生而起早的人，都是流落异乡的人。在瑞士干苦力的，都是外国人。

一家酒馆需要一位中国厨师，他竟然斗胆地前去揭“榜”了……

老板庆幸自己请到了一位“正宗”的中

国厨师，他哪知道伯鹿唱的是“空城计”？广告登出了，中国周就要开始了。胆大包天的伯鹿啊，这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不但误了人家的生意、砸了自己的饭碗，还会给驰名世界的中国烹饪艺术抹黑！他陷入了苦思，不是设法逃脱，而是寻求进击之路。他仔仔细细回想着母亲做菜时的每一道工序，回想着平生所吃过的每一种菜……中餐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归纳起来无非是煎、炒、烤、爆等等基本种类，好比红、黄、蓝三原色，在画家手里可以变幻无穷！伯鹿跃跃欲试，要以炒勺当画笔，施展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性！

中国周开幕前夕，不幸的是，伯鹿突然病了，胃出血，殷红的鲜血涌流不止！一位懂医的朋友惊呼：“你必须立即住院，不然会发生生命危险！”

在瑞士住院得花多少钱？那是伯鹿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天文数字！但是，那喷涌的鲜血却不是无论多么坚强的意志所能挡住的！多亏这位朋友给他找来了中国的云南白药，吞服之后，血止住了，但告诫他不能吃东西，以免伤了胃，病情复发，而且必须绝对卧床休息。

什么？掌勺的该出场了，他能躺下休息吗？他命令自己坚强地站起来，向餐馆走去，穿起了白罩衫，戴起了白帽子。开始吧，我准备好了！

老板和所有的厨师都围在他的周围，毕恭毕敬地看作操作。他从容不迫。那刀工，那配料，那火候，把洋人看傻了！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简直像一件件艺术品，伯鹿还把萝卜雕成栩栩如生的鲜花装点席面，不必依据什么模式，画家、雕塑家的创造性是无限的！

中国周名声大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老板催促说：“快，还要快！要不然，就供不上

了！”伯鹿加快速度，眼、脑、手超高频率运转，快！快！一个不留神，胳膊碰在烧得发红的锅沿上，“滋啦！”皮肉立即烫伤了一片。他似乎根本没有感到疼痛，一秒钟也没有停顿，继续操作。伤痛，就咽在心里吧；伤疤，就留在身上吧。不必呻吟，不必叫苦，这里没有他的妈妈，对谁说呢？

每天十几个小时，他凝神“构思”，连续“创作”，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懈怠，不敢作片刻喘息，怕一坐下就起不来了。老板对他说：“王，这里的東西，你随便吃！”可是他却决不动口，以“绝食”的姿态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老板不能不纳闷：这个怪人怎么肚子不知道饥饿？伯鹿不露病情，却自豪地解释说：“中国人的习惯，干活儿的时候不吃东西，要全神贯注！”老板赞叹不已，但他哪里知道面前站着的是一个随时都可能鲜血涌流、昏倒在地的病人啊！

整整三个星期，伯鹿仅靠下班后吃点儿牛奶、稀饭维持体力，把这出“戏”唱完了，唱得精彩之极。伯尔尼的饮食行业不胫而走地传说这儿来了一位中国名厨师，伯鹿却正色说：“我不是厨师，而是中国的画家。长街当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艺术！”

两千瑞士法郎拿到手了，有谁知道，那里边渗透着他的一腔热血！

现在，该结束那种“卖身为奴”的生活了，他平静地向房东辞行，并且感谢他毕竟曾经提供了方便。

老头儿却慌了：“走，你往哪儿走？离开了我这儿，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有钱了，打工挣了两千法郎！”

“两千？在我眼里等于零！”老头儿轻蔑地冷笑。

伯鹿也笑笑：“你看着吧，看一个中国人

怎样从零开始走向未来！”

中国人啊！欧洲有一句谚语这样形容他们：“假如世界上的人类全部在灾祸中毁灭，还会有中国人和蟑螂活着！”这话说得欠雅，而且把中国人和蟑螂相提并论，明显含有贬意。但其中不也道出了一个真理吗：中国人是死不绝的，他们的生命力举世无双！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伯尔尼。伯鹿陪我前往拜访祖国驻瑞士的大使馆。穿过一条条街道，我是那么陌生，他是那么熟悉。这儿，是他送报的地方；那儿，是他司厨的地方。这些地方都离我们的使馆很近，但我们的官员未必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同胞曾经怎样艰难地奔走。好在，这些都过去了。

前面，那座灰白色的建筑，就是伯尔尼美术学院，那也是伯鹿洒下汗水，留下足迹的地方。

.....

正当他获得两千法郎的“资本”向艺术的峰巅奋进时，又一个十字路口横在了伯鹿面前，他必须作出新的抉择。

在伯尔尼美院的第二个学期即将开始，德语老师玛丽安娜转告伯鹿：“院长要找你谈话。”他唯恐再发生像瓦雷那样的变故，惴惴不安地去见院长。院长说：“王，我非常欣赏你的才能和毅力，但是，我认为你不适合在这儿学习。因为，你要拿到文凭就必须学六年，和那些小孩子一样从头学起。你不必这样，应该到更适合你的学校、以更快的速度去攻读学位，比如巴塞尔美术学院和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都可以考虑。你的英文很好，我建议 you 到英国去，并且相信你一定会被录取！”

院长的话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但他庆幸又看到了一位识才、爱才、举才的长者，在他

摸索着攀登的途中指明了方向。他多么想去英国深造啊？但是，隔山隔海，路途遥远，他没有足够的经费。那么，就去巴塞尔吧？

玛丽安娜老师立即帮他向巴塞尔美院联系，结果却令人沮丧：招生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晚了！

前途渺茫，郁郁寡欢。这时，一些中国留学生约他去游西部城市比尔，东道主是瑞中友协比尔分会。他本无心流连山水，权且随波逐流，借那空蒙蒙山色、潋滟湖光一洗愁怅吧！谁能料到，一个将对他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并将使他终生难忘的人正在那里等着他，如果没有比尔之行，一切将失之交臂！

这个人，就是瑞中友协比尔分会的工作人员苏茜·冯哈勒——巴尔曼女士。白色的游艇在比尔湖中荡漾，我国留学生们好似回到了西湖、太湖，陶醉了！只有伯鹿双眉紧锁、凭栏沉思。细心的苏茜留意观察、轻声询问，向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伸出了爱抚的手，犹如昔日的 sister——就年龄而论，苏茜不是姐姐而可以做他的妈妈了。也许是因为“瑞中友协”所赋予的使命感，也许仅仅出于一副慈母心肠，**苏茜女士决心帮助这个艺高胆大却又势孤力单的年轻人，代替他那远在天边的母亲。**

胡克教授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位中国考生。看了伯鹿带来的作品，教授的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光彩。虽然招考工作已经结束，但他要招收的5名学生还没有定案发榜，现在，首先决定录取的是姗姗来迟的最后一名考生——一个中国人！

他到巴塞尔就读，必须有一位瑞士籍的经济担保人，而这个人又必须在银行里有10万法郎的存款才具备担保资格。伯鹿在瑞士举目无亲，谁肯为他担保？于是，苏茜女士挺身而出。因为她知道，这个角色非她莫

属了。然而不幸的是，尽管苏茜有着享受德国皇帝封号殊荣的姓氏“冯哈勒”而使警察局的官员肃然起敬，但她却并不同时拥有10万法郎的钱财！**一筹莫展的苏茜女士突然奇迹般地得到了一笔遗产：她去世多年的姨妈留下了巨额存款，没有子女继承，**银行根据线索找到苏茜：“你是她的合法继承人，请办理过户手续，不然，就归银行所有了！”苏茜本不愿坐享其成，但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啊，伯鹿有救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伯鹿又一次从零开始，在巴塞尔美院刻苦学习铜版、石版、丝网版画。是的，这并不是他最早选定的专业，但这里没有油画系。“艺术无止境”，他在实行自己的宣言，西方艺术的一切精华、任何长处，都在他的汲取之列。瑞士也并不是他选定的终生居住之地，如果让他的生命重新开始、重新降生，千遍万遍地挑选，还是那片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热土：中国。是命运逼着他“走向世界”，飞得再远，仍然心系故国，犹如永不断线的风筝。从瓦累、伯尔尼到巴塞尔，从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到哥本哈根、鹿特丹、西柏、汉堡、慕尼黑……他拍下了数千张艺术珍品的照片，积累了成箱成箱的学术资料，这些东西对中国培养人才有用啊，总有一天，他会完整地带回去，奉献于母亲的面前。海河之畔的母校啊，还记得这个被除名的儿子吗？两次过圣诞节，他都寄去了贺信呢，可惜没有收到回音！

离家一年半了，伯鹿以无不遏制的思念之情，花了60个法郎，第一次跟家里通了电话。

“三十而立，你已经三十一岁了！”他听到了父亲那不平静的喘息声。

慈父严母。父亲是柔弱的，但这是代表严厉的母亲、以委婉的方式在责问儿子：你

虚度光阴、愧对祖宗了吗？

该怎么禀报双亲呢？他能这样说吗？儿子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血红的脚印！

……

在 IAAB 为我举行的招待会上，我曾见到了胡克教授，他对我说：“伯鹿是巴塞尔美院最勤奋、最优秀的学生！”

对于来自中国的询问，这是最好的回答。

母亲节和《子归图》

31 岁了，伯鹿至今没有结婚，也没有女友。或许他是一个清心寡欲的苦行僧？或许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俄底普斯情结”，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母亲？“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是一个男子汉，又怎能没有七情六欲？他只不过强于自我克制而已。尚未立业，不想成家，他的胸中是一片海阔天空。他所深交的朋友当中虽然也有女性，但都是长者，sister、玛丽安娜、苏茜，她们对他的爱，像大姐、像母亲，这就足够了。

伯鹿仅仅请苏茜在名义上做经济担保人，而不接受她的任何资助和馈赠，他的一切费用都靠课余打工，自食其力。“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的富有创造性的手，应该发挥更大的价值！”苏茜深深地为他那辛苦的劳作而惋惜。她，在默默地帮助他……

五月，我的个人画展在巴塞尔开幕。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之内，伯鹿几乎没有睡觉，把课余时间都用来帮我布置展厅，熬得两眼血红。中国留学生都来了，公费的、自费

的，一起为我奔忙，已不分彼此。“伯鹿真好！”他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这样说。同胞们终于沟通了，理解了。开幕当天，IAAB 的负责人和来宾们走进展厅，大吃一惊——不仅赞赏作品和展览效果，而且惊异这个亲密团结的由中国人组成的小集体。当晚，这些兄弟姐妹和我一起举杯，伯鹿说：“祝贺王老师的展览成功，我们中国人打了个胜仗！”我说：“为我们的祖国，干杯！”

几乎与此同时，伯鹿的首次个人画展也在比尔开幕，是由苏茜女士一手筹办的。他的油画、版画和中国画作品终于受到了瑞士艺术界和社会的普遍瞩目，首都出版的《联邦报》发布新闻，盛赞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艺术家。

一颗中国艺术新星，正在西方冉冉升起……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在这一天，伯鹿挑选了自己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洁白的玫瑰，献给母亲般的苏茜女士；一幅是声声啼血的杜鹃（子规），托我在回国时带给他梦魂萦绕的生身之母。画上郑重题着：《子归图》，1988 年母亲节，赠母。

初夏的和风吹拂着莱茵河两岸，风从东方来，我仿佛嗅到了那黄杏红榴亲切气息，仿佛听到了那牵动游子之心的声声呼唤：“归去归去！”

我就要走了，带着我的兄弟的殷切嘱托，带着这幅珍贵的《子归图》，跨越万里云天，飞向我们的母亲身边……

纽约的白日梦

· 艾 丹 ·

客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我走出机舱，穿过很窄的通道，看见候机厅里的人群，看见了马杰。他冲着我走过来瞪着眼睛喊着：“干嘛最后一个钻出来？蠢驴。”他还是几年前那副样子。说实话，初来乍到，我便感到自己的确是个乡巴佬。我都有点想家了。

汽车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车跑得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快。路两旁是一栋栋孤零零的房子。我来纽约之前在西部的旧金山呆了几天。那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阳光明媚，和风徐徐，穿着裤衩背心就可以上街。早晨我走在街上，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有点象在梦游。我走过一个广场，喷水池边落着几只海鸟，绿椅上睡着几个黑人。我走过一家电影院门口，碰见一个比我高出半个身子的黑人，我当时没听清楚他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发现他穿的短裤好象是星条旗做的。回到住处，我给家人写了封信，就是那种不能不写而又废话连篇的信。我对家里人讲，我预感到能在美国发财。象我这样精力充沛的穷小子，为什么不能做上一出“美国梦”呢？我跃跃欲试。

汽车向着纽约奔驰，穿过一片布满石碑的墓地，便可以看见另一片更大的墓地，那就是纽约。远远望去，地平线上高楼如笋，仿

佛站在楼顶就能摘星钩月。谁又能想象一百年前那里只是一个渔村呢？渔夫们撒网归来，昏昏欲睡，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茅屋前会爬起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比恐龙还要神奇。如今，这变成了现实。

走进纽约就象走进大森林。

马杰一路上对我开玩笑，他在纽约住了四年多。他说：“哪儿我都不愿意去，我只能呆在纽约。”马杰到过许多地方，他象大泥鳅一样哪乱就钻到哪里。

1

12月的寒风吹在街上。我整个上午呆在屋里简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吸烟，马杰躺在床上看书，好象是一本情节怪诞的书，他看一会儿便跳起来去翻书架上的词典，他就不知道把词典放在身边。不仅如此，我发觉他还暗自傻笑，有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特别丰富，就好象是在跟对面的人讲话。我去拧电视机的开关，画画上有几个布娃娃在吵吵嚷嚷，它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名星，都会编故事骗孩子。换一个台，是一部据说演了十几年还没演完的连续剧，是发生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的故事，看架式这部俗剧起码还要再十几年才会有结果。再换一个台，是一群奇装异服的歌星，嗓子里发出了刀片划破玻璃般的尖叫声。再换一个台，是一位家庭主

妇讲她是如何烤牛排的，她胖得就象一头奶牛。这个城市有几十个电视台，我白天去学校念英文，回来后坐在电视机前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我住在马杰这里，他很少呆在屋里，一天到晚出去野跑，有时我也随着他满处野跑，也许脑子里同时都在想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也许脑子里一片空白象断了胶片的电影。我和马杰在格林威治村一带兜圈子，直走得不能再走，肚子叫唤，或是想起煤气还开着，门还没锁，于是匆匆地回家，就象现在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发呆。就这样发呆，联想，往事便会悄悄地从记忆深处爬出来，有时会爬得满处都是，虽然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却可以品得有滋有味。我想起了和马杰刚认识的时候，算起来年头可不短了，我俩不仅是邻居，而且是铁哥们，一同干过不光采的事情，他当时的外号叫“大头”，他从小就鬼精鬼精的。他上飞机去美国的时候几乎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当时我真替这个乡巴佬担心。一晃就是6年，我们没通过一封信，也不光是因为手懒，我的确是不大清楚该如何写信和写些什么，并且我是那种提笔就忘字的主，写信对我来说是挺困难的事。我只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知道他开过个人画展，他的画偶尔也能卖出去几幅。他以前画画很注重写实，后来搞起了现代派，满脑子装的是抽象的概念，灰色得很。

如今我站在他的画前，说实话，我不知所云。我万万想不到他这些年来搞的全是这类东西，象油漆工在布上调颜色后留下的痕迹，这其中是否包含着深邃的思想？我也拿不准。马杰早已不是许多年前的那个画童了。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有一次我提起马蒂斯画，马杰说令他恶心。他说凡高是性压抑者，是心理变态的小丑，而毕加索只具备了公鸡的思想。总之这类疯话他

说了不少，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大师如果是厕所的石头，马杰会毫不犹豫地一脚把它踢进屎坑里。

有时我觉得无聊了，也和马杰扯扯现代艺术，这是他津津乐道的东西。他会这样讲：“现代艺术就是个观念问题。除了观念，剩下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包括技巧在内都不重要。”我发现他和我说话时总有点紧张，可能他是生怕自己的语言缺少魅力。他有时说起事情来的确有意思，我学不来，但听他说话时，我常常装得心不在焉，这是我的小心眼在作祟。有一次他和我争执起来，我有点成心，我想挑他的火，于是他大声嚷嚷：“艺术不应该是思维、想象力的扩张，而应该是冷静的浓缩。具体的东西存在于眼前，值得去再现吗？听着除了观念，别的不足挂齿。”我当时没弄清他说了些什么，我又冒出一句：“那自然界呢？难道不存在着美吗？”他回答说：“我厌恶大自然，它离艺术太远，它除了自生自灭之外，并不具备别的品质。”我说：“你仇视美的东西，这和不少人的见解相同，你们的哲学自成一体”。我只想告诉他，这种理论并不是他的发明，他的见解也未必有个性。马杰苦笑一下：“来到美国后才开始懂得什么是艺术。”这小子无非是想说在此之前学了近十年的画全是瞎耽误工夫。记得那时他也是如此自信，那时的他对艺术有多虔诚。每天清早背着画夹在动物园、火车站之类的地方画速写，收集素材，他喝凉水吃凉饭，那时的马杰被一种内在的东西激动着，连他自己也摸不清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那是一种迟早会消失的东西。从事艺术的人总是要陷入一个接一个的苦闷期，如同迈入陷阱，难以自拔。艺术家几乎没有善始善终的。我问他：“你想家吗？”话音没落，我自己就后悔了：我真不该这样问。这是一句

很没意思的话。他没有正面回答：“过去对我来说尽是些恶梦。你说奇怪不？我现在还常常想起那些曾经虐待过我的人。你知道我爸打我的时候有多狠，他把所有的招数都使出来了。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那样恨我，他叫我‘白眼狼’，你看我象吗？”我知道马杰在夸张在渲染，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又继续说着，如泣如诉：“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过一丝温暖，那种日子我无法忍受，后来我快疯了，有一次我一怒之下把学校雕塑室里的破烂玩艺儿全都砸了。我知道自己唯一的路就出国，总还算如愿以偿。”他说得真动听。可是，来到美国你的感觉就好了吗？我自问，几年里你搬了十几次家，漂泊流浪，苦海无边哟。

2

我和马杰住在曼哈顿的下城，人们称这里是“嬉皮村”。这里不象是富人的住宅区，街道上的脏东西无人清扫，在寒风中满处乱飞。我们住在一栋六层楼房的第三层。隔壁是一户西班牙人，马杰告诉我：“那窝里全是贼。”我一来就清楚这里穷人多，一走进楼道，各家的疯狗就开始狂吠，感觉是一旦冲出来准会把人撕碎，离这儿不远的一条街就更糟了，满街尽是狗屎，我干脆就叫它“狗屎街”。马杰说他在纽约碰到的最倒霉的事情就是踩过三次狗屎，其中有两次是在狗屎街踩到的，有一次把鞋都粘掉了。我清楚马杰又在夸张，不过他的确踩过狗屎并且回到屋里才发现。狗屎街和我们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条街，我们出门时往往要从“狗屎街”穿过，在那里不能走直线，必须跳着走，不然就会踩着狗屎，臭得你几天都不舒坦，一辈子也忘不了。“狗屎街”的街口挂着一个铁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谁的狗在此拉屎罚款50美元。但是，这一带养狗的人太多，几乎

人人上街都牵着狗，法不治众。

3

这间屋子里堆放着名式各样的物品，有几样象是刚拣来的。包括坏了的放大机、没有电线的落地灯，还有一个大铁架子，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玩艺儿，就象是吊车的某一部分，马杰说是雕塑。墙上挂着几样东西，有贴在木板上的皮鞋和锅炉上的汽压表，马杰说是艺术品。如果打开壁橱，里面堆满了各类电器，有幻灯机、打字机、小型发电机、还有电钻、电锯、电钉枪之类的工具，各种颜色的电线缠在一起，你就是理也理不清。我明白马杰不仅要去做艺术家，还要去当体力劳动者。要去当建筑工、电工、搬运工，据说还当过包工头。我还和他一起去街上贴过广告，不是给别人做广告而是给自己做广告，上面写着：“我们有专业的技术，热情周到的服务，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出不多的钱就能把旧房变成新房。”我和马杰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一千多份广告贴遍了纽约市。我们把它贴在电话亭里，贴在商店的玻璃门上，贴在地铁车站里，贴在公园的树干上，贴得我俩腰酸腿痛无精打采。

4

这间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幅马杰的自画像。这小子虽然喜欢自我嘲弄，但骨子里却疯狂地爱着自己。除此之外还有一幅别人作的画，起名为安迪涡后。这个画家是马杰唯一感兴趣的人，这张画是马杰花钱从安迪涡后的一个朋友那儿买来的。安迪涡后刚刚去逝，他死得很不理想，他在街上突然发病后被送进医院，医生弄不清楚这人是不是靠失业的救济金活着的老头儿，他没弄清他的病因就往他屁股上扎了几针，后来才发觉所用的药物与他的病风马牛不相及，于是他不明

不白地死去了。留下了千百万美元的财产，留下了比千百万美元更有价值的东西，按马杰的话说就是“观念”。安迪祸后的死是纽约的一次不小的地震，就象是城边落下一颗小型原子弹。许多人沉浸在悲哀之中，几家大报社、电视台不断地报道着有关他的消息。马杰爱他爱得要死要活，这点他不说我也看得出来。他不但注意着有关安迪祸后的所有消息，而且还向我不断地重复安迪祸后说过的话，都是那种人人都会说但只有他一个人说出来的很富哲理的话。安迪祸后虽然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但热爱他的人没有忘记他。就连商店的橱窗里也挂出了他的照片。

5

从马杰这间屋子透过窗户向外看，对面街道旁都是陈旧不堪的楼房，好象都是五十年前盖起来的，就是那种窗户下面安装着防火梯的楼房。如今防火梯消防队不再使用，贼却常常从防火梯爬进屋里，就象狗钻进洞里一样简单。这类楼房年久失修，黑迹斑斑，就象被一场大火扫荡过一样。如果你了解这种楼房里住着都是些什么人，我敢说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我曾经随随便便地观察了一番，我注意到，有个老头儿无论刮风下雪他总是趴在窗口向外观望，街上没有行人的时候他依旧趴在那里观望，你怎么也别想猜透他脑子里正琢磨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有时他也会离开窗口，这时他便要在窗口摆上一顶巨大的野羊头骨，就是犄角长得又大又弯的那种。

另一个窗口里发生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就是那种住着一对年青恋人的房间里的事情。我只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何喜欢开着灯不拉窗帘光着身子在屋里晃来晃去。

还有扇窗户从来都是黑的，我从未见过那间屋子开过灯。但非常非常奇怪的是，那

扇窗户里好象总有闪光灯在不停地闪光，谁也别想搞清楚那间屋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搞些什么名堂，谁也不清楚里面住着的人是人是还是鬼。

6

我不想就这样把每个窗户都观察一遍。好在那栋楼心的边上是一座教堂，这是天主教堂还是基督教堂我不感兴趣，反正只要是教堂就能给我的内心带来安宁。圣诞节的那天晚上，我和马杰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同去教堂看热闹，因为规模太大以致那个教堂始终未能竣工。那天下着雨又夹着雪，教堂里大约聚集着好几千人，他们都是善男信女，心诚意诚地去参加宗教仪式，唯有我们几个异教徒是去看热闹的。后来每个人都点着了手中的蜡烛，几千支蜡烛把大厅照得亮堂堂的，那气氛神圣极了。他们每个人都会唱圣歌，唱得整齐抒情，象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这个教堂和其它许多教堂一样，平时房上落着许多鸽子。我也知道有一个教堂从来没有鸽子光顾，因为它已不再是教堂。它座落在纽约市中心，环境优雅，长春藤爬满灰墙。它的大厅如今被改装成摇滚乐舞厅，走进进去的人是为了寻求极端的感官刺激。每当夜晚来临，那里便会出现红灯绿酒醉生梦死的场面，电子合成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千百个舞者聚集在一起猛躁地板，他们奇装异服尽情狂欢，睁着千百双色彩斑斓的眼睛。

从此上帝只好带领着他的小天使们匆匆地飞走了。从此鸽子也不再光顾这座教堂。

7

我在纽约度过的这些日子，仿佛是我一